

一、受命于危难之中

1927 年 7 月 26 日，滚滚奔流的长江。

这一天 天空晴朗 骄阳高悬。在一艘开往九江的轮船上 两位矫健、英俊的年轻人正在船舱里低声交谈。一位是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周恩来，一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优秀生陈赓。他俩各穿着一身不显眼的夏装，举止平常，在熙熙攘攘的旅客中没有引起别人的过多注意。

早在黄埔军校，湖南湘乡出生的陈赓就十分仰慕周恩来，对他杰出的才干和卓越的领导艺术十分敬佩。几年来，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兄长与导师 处处尊重他 全力地支持他的工作。这次 陈赓陪周恩来由汉口到九江，会合已在那里的李立三、邓中夏、谭平山、恽代英等人，着手南昌起义的筹备工作。

7月12日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改组中共中央 成立由张国焘、周恩来、李维汉、张太雷、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，主持中央的工作。从而，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统治地位，标志着中共实行工作上的转变。

周恩来参加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，并受命来九江着手筹备南昌起义 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。同时 面对国内局势骤变 国民党右派纷纷向共产党下手，周恩来深知此行江西，是深入虎穴，是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前沿阵地，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。然而，历

来表现出大智大勇、无私无畏的周恩来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完成中央交托的任务，他决心竭尽全力地组织南昌起义。从他两道浓眉下明亮的眼眸流露出，周恩来对此行充满着自信、希望。

天气炎热，加上人多拥挤，船舱里弥漫着沉闷、混浊的空气。周恩来、陈赓低声交谈着。他们越谈越兴奋，脸上泛着红光。他们从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，谈到此次赴九江的使命；从当前的政治局势，谈到今后的革命前途。

红日渐渐西沉，轮船背着下沉的骄阳继续向东慢慢行驶着。

“走到甲板上吹吹风！”周恩来拉着陈赓到了舱外。他们扶着栏杆，深深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。随后，又敞开衣衫，任凭江风吹拂自己的胸膛。

这时，甲板上已站了不少人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欣赏长江两岸的风光。沐浴着夕阳的余辉，江面上涌起层层波光。此时，周恩来的心潮也在起伏着。

时间推移到这一年的4月。窃取了胜利果实的蒋介石，看到自己羽毛丰满，便在上海撕去了伪装的面目，发动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。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在社会渣滓的扶持下，他把罪恶的屠刀指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，公开打出反共反人民、背叛孙中山主张的旗号。一时间，上海的惨案迭起，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倒在血泊之中。

紧接着，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广西和广东等省，也相继发生严重的反革命事件，全国一片白色恐怖。

上海的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以及江苏等地的流血事件，震惊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。各地共产党人纷纷谴责蒋介石一伙的反革命行径，声讨他们背叛革命的滔天罪行。

共产党人的严正态度，并没有阻止住国民党右派屠杀工农、镇压革命运动的猖狂活动。中国革命继续恶化，大江南北一片反革命

的叫嚣。

5月20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“马日事变”又使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惨杀。

6月，自称是孙中山忠实弟子的汪精卫，步蒋介石的后尘，在武汉紧锣密鼓地策划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。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。随后，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先进分子，制造了闻名全国的新的流血事件。

面对着南京蒋介石与武汉汪精卫的同流合污，面对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败，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，决定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不屈不挠的斗争，扭转一落千丈的政治局势。

由汉口暂迁武昌的中共中央，首先把党的各级组织迅速转入地下，避免更大的损失。与此同时，临时中央常委决定将云集在九江、南昌一带的，由中共掌握、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背叛。于是，南昌起义被第一次给提了出来。

紧接着7月中旬中共中央着手制定湘、鄂、粤、赣4省秋收暴动计划，并且进一步完善了南昌起义的设想。中央决定，由中央掌握与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，争取联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，南下广东，实行土地革命，举行第二次北伐。

汪精卫公开反共之后，中共中央为了实施南昌起义的计划，派李立三、邓中夏、谭平山、恽代英、叶挺、聂荣臻等先后抵达九江作南昌起义的前期准备工作。不久，又派周恩来参加筹备的领导工作。

血气方刚的陈赓，虽说年龄不大，却有着不浅的资历。他1922年加入共产党，成了那时为数不多的一名中共党员。1924年他又成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，1926年还赴苏学习，1927年初回国。陈赓望着正在沉思的周恩来，他的心情也很不平静。近几个月来，

周恩来在革命危急关头的所作所为，一幕幕地闪现在眼前。

蒋介石在上海对工人运动残酷镇压时，正在该地的周恩来，立即会同赵世炎参加有 10 余万工人的集会，表明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严正立场。随后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一系列会议 提出对付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策略。他还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，明确提出“迅速出师 直指南京”的正确主张。

5 月下旬，在党的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，秘密乘船由上海到武汉，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，全力以赴地投入各项应变工作。

6 月初前后，周恩来紧张地开展对军队的组织、联络和政治工作 担任中共中央军人部 军事部 部长 组建以收集情报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特科，出席中央连续召开的各种紧急会议，参与对敌斗争策略的制订。6 月中旬，他又派出军事干部到湖南浏阳、平江地区发动农民 准备武装暴动。

这几个月，周恩来以职业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，预感武汉局势将起变化 在会见广东惠州、潮州、梅县农工救党军代表时 要求暴动队伍尽早返回原地，就地组织工农武装暴动。

7 月中旬，周恩来参加临时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之后，更是不分昼夜地为击退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而竭尽全力。他参与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》的发布，向全国工农大众表明谴责武汉国民政府背叛孙中山主张的态度。他同张国焘等一起主持党的机关及党员的疏散、隐蔽工作，力求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。他出席临时中央常委会议，研究南昌起义的设想，还建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、政纲和方针 切实计划发动湘、鄂、赣和广东东江一带的工农势力，以配合南昌起义部队的南下行动。

在繁忙工作之余，周恩来还到中央军委传达中央的决定，布置当前的各项工作。他明确地对军委工作人员说，国共业已分裂，我

们别无选择；只有举旗起义，以武装斗争形式反对国民党右派。

在蒋介石、汪精卫一伙国民党新军阀先后背叛革命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处于十分紧急的关头，周恩来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上，夜以继日地采取种种应变措施，制订各项斗争策略，忘我地为挽救大革命失败而努力。

“陈赓快到九江了。”周恩来的一句话使陈赓从回忆中醒过神来。他忙应了一句：“对我们该去收拾一下行李了。”

陈赓比周恩来整整小5岁。一路上，说不清楚谁照顾谁。按理说，周恩来是中央领导，陈赓又负有陪同周恩来到九江的任务，应担当起照料周恩来的任务。然而，在后者看来，陈赓还是一个小弟弟，加上周恩来素来不愿别人过多照料自己。因而，在途中有时还是周恩来照顾他、提醒他。

夜幕笼罩下的九江显得神秘、朦胧。低矮、陈旧的建筑群在月光下蒙上一层银色光环。稀落、暗淡的路灯，衬托出九江一派萧条、凋落的景象。加上各地传来的国民党右派滥杀黎民百姓的骇人听闻的消息，在夏天炎热的夜晚，街上也是行人稀少，一片寂静。

当晚周恩来同在九江的李立三、邓中夏、谭平山、恽代英等人会合。此时，李立三他们正聚在一起讨论南昌暴动的有关事项。看到中央派来的周恩来安全、及时抵达，他们一阵高兴，一个个拉着他的双手不放，问候寒暄，一时间，不大的小屋显得热闹非凡。

对于周恩来，李立三他们是再清楚不过了。他是资历很深的中共要员之一，长期从事党的领导工作。他既有高超的领导才能，而且也在日日夜夜激烈斗争中锤炼出令人崇敬的高贵品格。他那神采奕奕的风度，外弛内张的神情，以及钢铁般的自制力，使不少人受到鼓舞，也令不少敌手胆怯。他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声望，始终得到大家的尊重、爱戴。如今在中国革命局势剧变的风头浪尖，周恩来深入白色区域，领导南昌起义的筹备工作，更让大家肃然起敬。

望着周恩来那一副瘦削的脸庞，李立三他们又深深感受到前一时期的周恩来工作的紧张、劳累程度。为了中国革命的复兴，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不知疲倦的周恩来一定四处奔波、日夜操劳，使本来就单薄的身子更加显得消瘦。然而，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，那洪亮有力的讲话中，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鞭策。那眼神、语音，表明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无限乐观，对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充满信心。受到周恩来的感染，李立三他们的情绪更加高涨，连日来的辛劳也一扫而光。

周恩来对早期来到九江筹划暴动的李立三等人，也充满着敬意。受中共中央的委托，李立三、邓中夏和谭平山 7 月 19 日到达九江，了解政治、军事情况，策划受党掌握的北伐军重回广东，发动农民暴动，进行土地革命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，开展同新、老军阀的斗争。连日来，他们冒着酷暑，顶着烈日，紧张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，为南昌起义创造了重要的条件。周恩来用称赞、崇敬的眼光，向李立三他们扫去，脸上也荡漾着舒心的笑容。

“现在，请恩来同志传达中央的决定。”待大家相互问候一番之后，个子高大、精力充沛的李立三宣布会议重新开始。

“这样吧，还是你们先把几天来的情况说一说。”周恩来把脸转向李立三，恳切地说。

“好，我说说这里的情况。”李立三是湖南人，地方口音还很重。他简要地把来到九江后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个介绍。

李立三一行 19 日抵达九江之后，第二天即会合叶挺、聂荣臻、吴玉章、林伯渠等召开了会议。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；聂荣臻是由周恩来在武汉指定的前敌军委书记，负责到各部队传达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；吴玉章是按中央的指示，16 日来到九江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，以接应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到南昌开展武装起义。

由李立三主持，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形势，还具体分析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政治倾向。

在一间不很宽敞的厅堂里，与会者围坐在一起，不停地摇着纸扇，坦诚地谈出各自的看法。

张发奎握有兵权，有重回广东发展的意图。因此，中央打算联合他共举南昌起义大旗。

“张发奎转向汪精卫反共的倾向，越来越明显。如果我们再采取联合张发奎的政策，那末必然对我们举旗起义不利。即使到了广东，也会让我们成为张发奎勾结汪精卫的牺牲品。”会上，不少人对张发奎的动摇与右倾，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。

“中央原来打算利用张发奎，把他统一指挥的全部武装都南下广东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。如今看来，这一计划无法实现，应及时予以更正，以避免我们的损失。”上述意见，获得与会者的普遍支持。

主持会议的李立三，也了解到不少有关张发奎态度日益右倾的情况。因此，他综合大家的意见，作出了“抛弃依张之政策，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”的决议。同时，他根据当时的局势，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，决定“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。”

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是由贺龙统率的一支部队，对蒋介石、汪精卫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。他们积极支持工农运动，可以成为南昌起义的一支主力军。

按照会议的决定，聂荣臻等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进行秘密传达。他们向负责干部介绍当时的形势，说明南昌起义的目的与任务，表明同国民党右派决裂的决心。聂荣臻等还要求各部队作好准备，等待中央的命令。其间，按周恩来交代的任务，聂荣臻设法找到了正在治疗肺病的刘少奇，通知他中央组织南昌起义的决定。

与此同时，李立三、邓中夏马不停蹄地直奔庐山，向正在那里的瞿秋白、鲍罗廷、张太雷等通报九江会议情况。

瞿秋白、张太雷都是中共的要员，前者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，后者则同周恩来一起在 7 月 12 日成立临时中央常委。鲍罗廷虽说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，没有担任中共中央的任何要职，却对中共的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瞿秋白等完全赞同李立三他们的意见，还受李立三的委托，去汉口向中央作汇报。

23 日，贺龙到达九江。谭平山热情地接待了他，向他谈了南昌起义的计划，试图了解他的意向。

“好 我完全支持！”快言快语、为人爽直的贺龙毫不犹豫地双手赞同起义计划。随着贺龙的热烈反响，悬在谭平山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算落了下来。

在谭平山找贺龙密谈的同时，李立三、鲍罗廷、林伯渠、郭亮等在庐山仙岩客寓开会，研究南昌起义的其他重大问题。

绿荫掩映的仙岩客寓 环境幽静 行人稀少 空气清新 是理想的商议要事的地方。李立三他们认真研究事关南昌起义的重大问题。

正在这时，九江的邓中夏、谭平山得知消息，张发奎同汪精卫合谋在庐山开会，解除第二方面军中共产党员担任的领导职位。“情况紧急，应立即报告李立三他们。”邓中夏等人商量后，把此情况火急地报告给李立三。于是，李立三他们又急忙赶回九江，同山下的邓中夏等人商议对策。

尽管多日来上下奔波，无暇休息，然而，李立三丝毫没有疲劳之感，一到九江，马上同邓中夏等人研究对付张发奎、汪精卫的策略。

鉴于张汪合流后对共产党员要加以“清洗”因此 李立三主持

的会议断然决定，“军队于 28 日以前集中南昌，28 日晚举行暴动”。会议还决定 打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以团结、争取更多的爱国人士，组成共同对抗蒋介石、汪精卫的浩荡队伍。为此，会议提出“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、党权、军权之最高机关 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 继承国民党正统”。

李立三主持的 23 日会议，还就其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。但是，因各种意见相持不下，没有形成决议。

次日，果然收到了张发奎的通知，要求叶挺、贺龙上庐山开会，还要求他们的部队集中在离九江 100 余里的德安待命，不准任意移动。这一天，正在九江的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，也转告叶挺、贺龙 让他们到庐山开会。

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着李立三的介绍。忽然，他发现李立三满头大汗，忙递上一杯水：“立三同志 喝口茶。看你 热得一身是汗。”说完，还用扇子替他扇了几下。

虽说到了晚间，可是，依然是使人感到酷热难熬。大家不时往脸上擦汗，还不时端起茶杯，大口大口地喝茶。

李立三喝了几口水，他那浓重的湖南语音又在室内响起。

时间到了 25 日。这一天，叶挺、贺龙会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、武汉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、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在九江甘棠湖开会。为了避人耳目，他们找到了一条小船，在船上秘密商议。经过反复磋商，决定了三项决定。

一是 叶挺、贺龙不上庐山开会 以防不测。二是 叶挺、贺龙部队不去九江南面的德安集中，不中张发奎的诡计，而是由牛行车站去南昌。三是，叶挺所部在 25 日动身，贺龙所在的第二十军 27 日出发赴昌。

“好 叶挺、贺龙有志气。”周恩来插了一句话 对叶挺、贺龙的坚定态度大加称赞。

李立三简明扼要地把几天来的情况，向周恩来作了汇报。从周恩来流露的表情来看，对他们在九江的工作是满意的。尤其对李立三在很短时间内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，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周恩来喝了一口水，说了几句赞扬的话，便把中央有关南昌起义的意见向他们作了传达。他语气肯定地说，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已有一致意见，对你们给中央的报告也表示赞同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说下去：“我们要加紧工作，确保南昌起义如期举行。”

夜深了，四周变得死一般的寂静。深夜的阵风，驱散了白天的酷暑，给人以舒心的感觉。

在周恩来、李立三主持下，会议还讨论了起义过程中分配土地的问题。尽管已经临近半夜，然而，与会者的情绪还是十分饱满。围绕着民众关心的土地问题，他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

土地问题，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。土地，也是广大农民群众赖以生存的基础。中共自 1921 年创建，就十分注意土地问题。新的临时中央常委在蒋汪一片反共声中组建之后，依然高度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，在 7 月 16 日召开的会议上还作出了相应的决定。南昌起义从发动那一天起，对土地问题也十分关注。7 月 23 日，由李立三主张的一次会议上曾认真研究过土地革命的政纲。会上，李立三、恽代英坚决主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。他们认为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体现南昌暴动的意义，才能实现南昌暴动的目的。邓中夏、谭平山则发表了相反的意见，认为不应对大地主的土地予以没收。他们担心，一旦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口号，会引起农村反动势力的恐慌，进而增加暴动的对立面，造成军队内部的分化，最终给南昌起义带来不利。由于认识不尽一致，那次会议无法作出土地分配的决议。

办事果断、善于决策的周恩来，眼看大家对土地问题的争论较大，一时间无法统一思想，便把中央的意见说了出来。他一字一句

地说道：“中央的意见是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，这样才能取信于民，为南昌暴动创造有利条件。”

经过周恩来的细致工作，形成了会议的共识，取得了大家一致的意见。

“这次会议结束后，我们要积极进行军事的准备，赢得武装起义的胜利。”周恩来反复叮嘱大家，要做好南昌暴动的军事工作，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中。他还委托邓中夏返回汉口，把详细计划向中央报告。

奔波了一整天的周恩来，丝毫没有倦意。他又把聂荣臻留了下来，交代他设法把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，参加武装暴动。

周恩来想了一想，向聂荣臻作了这样的交代：“我们在南昌打响后，发一列火车到马回岭。你们连人带辎重，马上乘火车赶来南昌。”那时，部队之间还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，民间电报又不可靠。不得已，他们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取得联系。

交代各项工作之后，周恩来、李立三、谭平山等连夜从九江出发，前往南昌，去迎接即将来临的大风暴。

二、打响第一枪

东方渐渐露出了乳白色，新的紧张的一天又将开始。稍作休息的周恩来，站在车窗，望着东方的晨曦，若有所思。在他看来，即将来临的南昌暴动，如同黎明的曙光，正向人们昭示中国革命揭开着新的一页，充满着新的希望。

清晨，周恩来会同李立三、谭平山等乘火车抵达南昌。

位于赣江边上的南昌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。它的名字取之于“南方昌盛”、“昌大南疆”。2000多年来，南昌孕育出一个个令炎黄子孙自豪的风流人物，也使南昌的历史灿烂辉煌。

周恩来还了解到，大革命时期，南昌的党组织活动非常活跃，成了江西最早一批共产党员施展才干的舞台。在他们的组织、发动下，南昌的工人运动、学生运动蓬勃发展，在全省起着先锋作用，也把整个江西的工农运动给搅动起来。相比之下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不是很多，战斗力也不算强。这一切，也是促成中央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因素。

27日这一天，周恩来住在花园角4号朱德寓所。它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，前后两进。还在这一年春天，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尚未破裂，朱德在南昌创办了军官教导团，培训进步基层军官。他还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，负责维持全市的社会治安。为了便于开展活动，朱德租下了这栋住宅。

周恩来和朱德，可说是知交了。追溯到 1922 年，他俩在德国柏林就认识。那时，朱德渴望追求真理，不远万里从上海抵达法国巴黎。当他得知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、自己所钦慕的周恩来在柏林时，又匆匆赶到那里。在柏林，已过 36 岁的朱德拜访了周恩来，情意切切地陈述了自己的身世以及四处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。他还向比自己小 11 岁的周恩来表达了加入中共的决心。同年 11 月，由张申府、周恩来介绍，朱德光荣地成为中共一员。自那时起，朱德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情谊越加坚固。前不久，他们还在汉口有过短暂的接触。

那是 7 月中旬在汉口一次四川革命人士的集会上。刘伯承、吴玉章召集的这次会议，周恩来、朱德也参加了。周恩来在会上分析了形势，征询了对发展革命军事力量的意见。当时，有人主张回四川再干。朱德则持不同意见，主张到江西发展。他根据自己在江西工作半年的体会，认为江西的工作基础很好，可以作为革命力量发展的基地。那次会上，周恩来、朱德之间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周恩来住进朱德寓所，既是为了看望老朋友，更主要是为了从朱德那儿详细了解南昌城内的敌情。原来，朱德 6 月下旬被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“礼送”出境后，到了武汉。7 月 21 日，他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返回南昌，目的是趁朱培德不在南昌之机，摸清国民党在南昌的兵力及部署。在国民党军队中，朱德享有很高的威望，并有不少老关系、老部下。中央考虑再三，认为他担当此任务再适合不过了。

对于中央托付的任务，朱德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。一回南昌，他四出活动，利用各种机会了解敌情。在短短的几天中，朱德摸清了情况，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的任务。

27 日，又是一个骄阳似火、热浪滚滚的日子。南昌堪称中国的“四大火炉”之一。盛夏季节，持续一个多月的高温，让人感到如人

蒸笼。

周恩来挥动着扇子，细心地听取朱德的汇报。根据朱德的介绍，当时驻在南昌的敌军约有 3000 余人。其中有第五方面军警卫团，第三军二十三、二十四团，第六军五十七团，以及第九军七十九、八十团。

“至于这些敌军的武器装备及部署情况，都在这图上。”朱德拿出一张自制的南昌简图，上面一一标明各路敌军的火力配置及驻地。

“玉阶兄，你想得真周到呀！”周恩来亲切地对朱德说，并高兴地接过地图，认真地看了起来。不一会，他把崇敬的目光投向朱德，“好，好，玉阶兄，你为南昌起义立了头功啦。”

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朱德在短短五六天时间内详细了解到敌军的兵力及分布，无疑为南昌起义的顺利进行创造了重要的条件。周恩来对朱德所做工作的喜悦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当天，在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，成立了由周恩来、李立三、彭湃、恽代英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，周恩来任书记。鉴于谭平山在政治上负很大责任，又一直参与南昌起义的筹备工作，因此，也决定让其参加前委会议。不久，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也参加前委的领导工作。

位于南昌繁华地段中山路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，建于 1922 年，1924 年竣工。那是一座四字型的大楼，共 5 层，有 96 间客房。领导南昌暴动的前委及总指挥部皆设于此，因而也使这栋四字型的旅社成了南昌起义的见证物，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。全国解放以后，这里成了南昌起义纪念馆，向国内外游客开放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“今天是前委成立的第一次会议，对南昌暴动的准备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检查、落实。”周恩来主持召开首次前委会议，向与会者通

报了议题。

“原定在 28 日晚，也就是明晚举行暴动。现在看来，时间太仓促了，于起义不利。”会上，有人建议推迟暴动的时间。

周恩来清晨抵达南昌后，从各方面了解情况，也感到 28 日晚举行暴动显得匆忙。因而，经过讨论，以“当时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”为由，决定改在 30 日晚发动起义。

这一天，气温依然居高不下。有人从外面买了个大西瓜，大家一边吃着西瓜，一边商议武装起义的有关事宜。

这时，周恩来脸色严肃地对其他人说，“今天是 27 日，离暴动还只有两三天时间。我们一定要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确保这次起义万无一失。”

几年来的政治生涯，养成周恩来严谨、过细的工作作风。他考虑问题，既有运筹帷幄、高屋建瓴的将帅气概，又有认真、细致、务实的特点。对于中共独立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，他更是事事过细，使它不出现任何不该有的差错。

在正式组建前委的同一天，叶挺、贺龙率部队，不露声色地先后悄悄到达南昌。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，是参加南昌起义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，在即将举行的武装暴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为此，28 日，周恩来专程到二十军指挥部会见了贺龙。

第二十军指挥部设在子固路 95 号，原为中华基督教圣公会宏道堂。前面是教堂和宏道中学教室，后面是一栋 3 层小楼房。贺龙、刘伯承等人就住在这栋小楼。

虽说此时贺龙还不是中共党员，然而，他一贯支持工农运动，一贯支持共产党的主张。对周恩来，贺龙更是十分敬佩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周恩来是中共资历很深的一名早期党员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乃至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，周恩来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，在各界人士中有着广泛的影响。因此，贺龙在自己的住处热情地接待

了周恩来。

在周恩来眼中，贺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传奇人物。湖南桑植出身的贺龙，年仅 18 岁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，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。在长期戎马生涯中，他屡建奇功，节节提升，先后任营长、团长、旅长、师长、军长。1926 年，他先后率领第九军第一师及第二十军，投入震惊神州的北伐战争，为扫除旧军阀的势力立下了不朽的业绩，在军界享有很高威望。

“云卿兄，非常欢迎率部参加南昌起义。”贺龙原名贺文常，字云卿。周恩来热情地把手伸了过去，直呼他的字号。

“为国为民出力，是义不容辞的。”一口湖南话的贺龙，为人坦率，性格豪放。短短的两句话，把他爱国、爱民的赤诚之心掏给了周恩来。

会见中，周恩来把中央及前委关于举行南昌暴动的决定，以及具体的行动计划，全盘告诉了贺龙。周恩来还提到，把暴动时间推迟到了 30 日晚，以作好军事上的必要准备。

贺龙深知，周恩来把秘密进行中的南昌起义计划毫无保留地透露给他，这是共产党信得过自己，把自己视为同路人与知己。他拉着周恩来的双手，眼里滚着泪珠，激动地说：“共产党信任我，本人十分感谢。”顿了顿，他又坚定地表示：“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，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。”

贺龙坚决的态度、恳切的语气，使周恩来对南昌起义更加充满信心。

正当周恩来在紧张地筹备武装起义，并对中共独立领导的南昌暴动充满信心的时候，一瓢冷水向他重重泼来。

29 日，周恩来连续收到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自九江发来的两份密电。张国焘在密电中果断要求：“暴动宜慎重，无论如何候我到

再决定。”张国焘的这两份口气很硬的密电，无疑给正在紧张筹备的南昌起义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张国焘是 27 日清晨由湖北进入江西的。那一天清晨，周恩来由九江到达南昌，张国焘则由汉口抵达九江。一到九江，他以中央代表身份立即召集前委委员恽代英、少共中央委员贺昌以及高语罕、廖乾吾、关向应、夏曦等人开会。

在中共，张国焘也算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要人。他在党内的资历应该说不浅的。还在 1921 年中共刚刚成立时 张国焘就任组织主任（后改称组织部长）地位仅次于党内第一号人物陈独秀。之后 在党的二大至五大 他几乎都是显赫人物。可是 张国焘在重要时刻的表现，却同他的显要地位并不相称。在党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中的所作所为，张国焘也留下了不少为后人唾弃的历史证据。

在 27 日的九江会议上，张国焘以不可一世的姿态，对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横加指责，要求重新加以审议。

“南昌暴动非举行不可 组织武装起义的决心不可动摇！张国焘在会上的错误意见，理所当然地遭到与会者的断然拒绝。

专横跋扈的张国焘并不甘心，又接连从九江发了两份密电给周恩来等人，对南昌起义说三道四，对周恩来他们施加压力。

张国焘的电报 并没有动摇周恩来组织南昌暴动的决心。他主持的前委作出令张国焘不快的决定：“暴动决不能停止，仍继续进行一切。”

正在这时 汪精卫、孙科、朱培德、张发奎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 商议反共之事。会上 张发奎反革命的面目进一步暴露 附和汪精卫高叫反共。汪精卫、张发奎等人作出三项决定，使局势愈加紧张起来。他们作出的决定，大多是针对正在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及其领导人的。其中一项是，严令叶挺、贺龙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。还有一项决定是 逮捕廖乾吾、高语罕、恽代英、朱其华等 4 人